

1963年10月，北京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是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出面邀请，以“私人名义”访华，却不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而且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待。这位特殊来客，正是为1964年中法建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

富尔访华何以成行

富尔生于1908年，曾在1952年和1955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在多届内阁中担任部长级职务。在对华态度上，富尔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至6月，富尔夫妇曾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之邀，以私人名义首次在华访问。在中国，富尔受到了热情招待，毛泽东亲自接见，周恩来也同其有多次交谈，而且几乎不受限制地走访了许多地区。访华期间和访华后，富尔多次主张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富尔回国后，借鉴毛泽东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写了本专著《蛇山与龟山》介绍中国，主张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在二战期间即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戴高乐1958年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表示公开支持。戴高乐曾在1960年召见富尔，商谈远东问题。富尔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方顾问”。

富尔之所以能在1963年再度访华，除了他对华友好、同两国领导人有私交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法两国的外交战略及对彼此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在美国影响下并未予以承认。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中国，当时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格局从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态势演进，美欧矛盾和中苏分歧的加剧，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

1963年富尔访华：中法建交的“前站”

□ 姚百慧



1963年10月，周恩来接见富尔夫妇

同意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李清泉于8月31日向富尔口头转达了张奚若的邀请。而富尔在收到邀请前，戴高乐接见了，并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去中国。戴高乐后来还给了富尔一封类似委托书的信函，表示自己重视和中国“各方面关系的问题”，并“完全相信”富尔“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就这样，本想以“私人身份”访华的富尔，成为肩负谈判中法外交关系的总统“特使”。不过，富尔多次向中方强调，对外还是宣布前一身份。

富尔访华何以成功

1963年10月21日，富尔与夫人自深圳入境抵广州，22日乘机抵达北京。自10月23日至11月2日，周恩来、陈毅同富尔进行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了在三项默契基础上的中法直接建交方案。11月2日下午，毛泽东接

见富尔夫妇，周恩来、陈毅陪同。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

富尔访华任务之所以顺利完成，首先是中法战略及对彼此政策调整的结果。毛泽东接见富尔时，重提了他几年前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如果苏、中、英、法有大体一致就好……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世界局势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像英、西德、意大利、日本，独立性会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这种大战略，富尔自然无法答复，只能笼统地表示“这是个好意见”。而就在4天后，完全不了解富尔访华情况的戴高乐却作出超时空的回应。

中国领导人与富尔的平等对话及

坚持原则的灵活外交，为富尔访华的成功铺平道路。这既体现在礼遇等形式上，也体现在协商的实质内容上。虽然富尔并未携带“特使”证书，但中方始终以此身份来接待，在出行、住房、谈话中，都给予其戴高乐特使的礼遇。在实质问题的商谈上，中方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下，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

富尔访华的成功，自然也与富尔具备充当“龟山”与“蛇山”之间的桥梁资质有关。富尔本人曾两度出任总理，资历深、地位高，在戴高乐政府中虽无官职，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深得戴高乐的信任；而在对华关系上，富尔一直主张对华友好，并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再加上富尔律师出身，能言善辩，是个谈判能手。这一切，使得富尔自然成为“担负秘密使命的适宜人选”。

中法建交的“前站”

11月2日，周恩来总理和富尔达成了中法“直接建交方案”，基本内容为法国来照承认中国、中国复照予以同意，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往来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法之所以达成了在照会中不提台湾当局的“直接建交方案”，是基于在法国不支持“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对如下三点达成默契。

一是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是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是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富尔访华归国后，法国于1963年12月12日派正式代表到瑞士与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进行谈判，经过4轮商谈，中法两国按约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尽管最后的中法建交是采用联合公报而非互换照会方式，但法方代表承认“了解富尔先生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精神”，他“就是根据这一精神奉命提出了最简便的方案”。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回顾富尔访华的历史，我们仍然同意李清泉大使在回忆录中的精辟总结：“瑞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谈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决了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当然，方式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原则问题。”富尔访华对实质问题、原则问题的解决，可以说为中法建交建造了坚实的“前站”。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尤山度：第一代匈牙利汉学家

□ 徐宝铎

海外汉学家

尤山度（Józsa Sándor），匈牙利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匈牙利罗兰大学中国系名誉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的研究和传播，代表著作有《汉语课本》《毛泽东诗词二十一首》《中国与奥匈帝国》等，2023年获得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尤山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匈牙利汉学家，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匈文化交流、增进中匈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作出了贡献。

结缘中国：幸遇改变一生命运的留学机会

1950年12月，罗马尼亚5名留学生、保加利亚5名和匈牙利4名留学生陆续抵达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正式开课。尤山度就是4个匈牙利学生中的一员，而且成为这4人中唯一一个一直从事中匈友好合作的汉学家。现在看起来这只是一组简单的关于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历史数据，但在当时，这组数据背后涉及的却是新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关系发展的重大决策。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专修班的有关工作，并责成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组成专门小组，拟定计划与有关国家商谈交换留学生事宜。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被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班的班主任，中国政府对这个专修班的师资配备可见一斑。匈牙利政府对第一批学生的选派也非常重视，在全国范围内物色合适的人选。幸运的指针就这样不经意间滑向了尤山度，中匈两国加强人文交流的大势，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本科的专业是研究匈牙利的近代史，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到中国去学习中国的近代、现代史。”时过多年，谈起这段过往，尤山度依然难以抑制发自内心的激动。据他介绍，20世纪40年代末读完匈牙利本科专业的他，毕业后被国家分到外地的中学教课，不出意外的话他会一直在匈牙利当中学教师，他从没有想过自己工作与生活会和遥远的中国发生任何关联。但是，“1950年11月的一天，

一封来自首都布达佩斯的‘神秘电报’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并自此把我的命运和中国牢牢连接在了一起，我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只是被告知，自己同其他几位大学毕业生马上出发去中国学习。我那时非常兴奋、激动时也有些茫然，中国在哪里、中国是什么样子，这些对于年轻的我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那是一次非常漫长的旅行，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足足坐了15天的火车，才从布达佩斯经莫斯科到达北京。”70多年过去了，说起与中国奇妙结缘的经历，尤山度的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走进中国：见证中匈友好交往的诸多历史瞬间

1950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在刚到中国留学的尤山度的印象里，各个方面还都不是特别的发达，甚至有的方面还相当的落后，但是，他和其他同学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接受汉语培训，给我们上汉语课的老师，是全北京最好的老师。他们原先是英国、美国大学里的客座教授，被国家从国外召唤回来，为我们做汉语培训。”尤山度评价他的中文启蒙老师们为“最高级、最亲密的老师”，老师经常会直接到他们的宿舍嘘寒问暖，主动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过年的时候会用保温瓶送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1952年冬天，尤山度从清华大学搬到了铁狮子胡同1号的人民大学，他对那年北京冬天刺骨的寒风印象深刻——“我们穿着自己厚厚的西服，但也还是很冷”。然而这种寒冷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时并不富足的中国政府想方设法为留学生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人民大学很快为他们定做了棉袄，解决了他们受冻的窘境。

提到自己在中国的老朋友，尤山度谈及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郭玉恒和他夫人的一件趣事：“郭玉恒在匈牙利罗兰大学东亚教研室任客座教授时，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名叫布达，布达佩斯的布达，另一个孩子名叫佩斯，布达佩斯的佩斯。原因是布达出生的时候，他们住在布达的一个



1950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迎来了第一批东欧学生

旅馆。佩斯出生的时候，他们住在佩斯的一个旅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他的眼中，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的人民彼此间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这种情感一直伴随着他70年的汉学生涯，是他不断走进中国、研究中国和译介中国的巨大动力。

1955年回国后，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尤山度主动要求去匈牙利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中匈交往频繁，匈牙利外交部非常需要会说汉语的人，于是在匈牙利中国科学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被抽调进了匈牙利外交部。原因很简单，他那时是唯一一位会说汉语的匈牙利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周恩来、朱德等许多访问匈牙利的中国重要领导人做过翻译。在他的相册里，至今还珍藏着许多与这些中国领导人的合影，这也成了他的中国记忆中最为珍贵的部分。1956年1月，朱德访问匈牙利，尤山度担任官方翻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送给朱德一柄特制的马刀，朱德兴奋地从刀鞘里抽出马刀，高高举起。说起这个场景，尤山度十分的骄傲：“我作为当时唯一在场的翻译，就站在他身边，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宣介中国：取得促进中匈交流的重要汉学成就

1956年，尤山度离开外交部进入罗兰大学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75—

1976年间，他被再次抽调派往匈牙利驻华使馆工作了一年。1976年9月，尤山度回到匈牙利，继续任职于罗兰大学的中文系。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匈牙利大学里的中文教材非常有限，仅有的几种教材不能完全满足匈牙利本土教学需要。”尤山度回忆说。他与同事高恩德决心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以及汉语教学实际，选取中国最好的教材，改编为一套适合匈牙利学生使用的教材。教材问世后，尤山度自豪地说：“虽然我和高恩德直到退休还是副教授，但我们合作编写的这套教材，给无数匈牙利学生了解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比什么职称头衔都要重要。”尤山度编辑的这套4册本《汉语课本》教材，是匈牙利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汉学学习资料，到现在还一直用于匈牙利学生的汉语教学。

1988年至1991年，尤山度被北京外国语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为中国学生讲授匈牙利历史。这之后他就一直活跃在中匈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

“做研究70年，我的研究视野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个研究对象。”现在已经年逾90岁的尤山度依然笔耕不辍，许多学术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中国与奥匈帝国》一书中，基于自己对于中国和匈牙利两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将1949年后的中国与匈牙利的关系与历史，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是迄今为止十分珍贵的史料汇编。在尤山度看来，“匈牙利文化的独特性来自于其东方根基”。

在他书房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幅用汉字写就的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

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尤山度认为，“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一直在为生存和自由而战斗。而近代以来，中国曾遭受着半殖民统治并与之抗争”。这让两国之间有更好的相互理解的基础。

尤山度在中国文化翻译方面更是成果斐然。因为在匈牙利外交部做过口语翻译，尤山度有机会接触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他们的魅力与风采给年轻的尤山度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我经常翻看《人民日报》，报纸上出现的毛泽东诗词深深吸引了我。我试着吟咏这些作品，用心体味诗词中的情怀和意境。”“我最喜欢《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诗词中蕴含的那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磅礴气势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阔情怀，开拓出一种诗词新境界。”尤山度认为自己虽然学过中国近现代史，也熟练掌握汉语，但却很难完全理解毛泽东诗词，因此“不如把它们翻译出来，这样不仅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学习，也能检验我是否真的读懂了这些诗词”。最终，尤山度通过查阅资料、与中国朋友探讨交流，与匈牙利诗人反复探讨，整理和翻译了毛泽东21首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二十一首》为书名，用中匈双语对照的形式于1958年在布达佩斯出版。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这本书中文部分出自当时匈牙利最好的中文书法家的手笔，并用红色印刷，书籍封面采用了当时最昂贵的丝绸封面，印制十分精良。尽管定价很高，作为第一部匈牙利语的毛泽东诗词作品，这本书还是很快就销售出3000册，在匈牙利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1959年，朱德访问匈牙利期间，匈牙利领导人送给朱德一本《毛泽东诗词二十一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为尤山度在扉页上签名。毛泽东的签名尤山度一直珍藏着，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作为一个汉学家所获得的殊荣。

尤山度曾这样说道，“我退休以后，也没有停止中文教学和中国研究。成年以后，我的一生都在和中国打交道”。这是从事汉学研究70年的尤山度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深情地表达了他与中国紧密的生活交织和情感连接。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汉学与中国学院院长）